

北大圖書館三本書之奇遇

• 徐 冰

也許由於母親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工作的關係，我這輩子總與書有交集。兒時她因為工作忙，經常是他們開會，就把我關在書庫裏。我很早就熟悉各種書的樣子，但這些書對我又陌生的，因為那時我還讀不懂。而到了我們能讀的時候，又沒甚麼書可讀，全國人民基本上只有一本「小紅書」。文化大革命結束後，我回到城裏，逮着書就讀，跟着別人啃西方理論譯著，弄得思想反倒不清楚了，倒覺得丟失了甚麼。就像是一個飢餓的人，一下子又吃得太多，反倒不舒服了。這也是為甚麼我的藝術總是與書糾結不清的原因。我、我們與書的關係是扭曲、錯位的。

中國傳統和成長環境讓我對書懷有敬意，下意識總是往文化代表物的「書」上湊，但只能湊到書的外部，離書的內部甚遠。好在書的閱讀功能正在被觸屏取代，書開始承擔起「文化情感寄託物」的功能，一部分人就開始變得對紙質書的裝幀、外觀這些書籍內容之外的、物質化的部分更看重起來了。這裏講講北大圖書館三本書的故事，都與書的內容無關。

一 「大字本」

世界上有一種書叫「大字本」，書名不怪、書卻很怪；大開本、豎排版、線裝書。字體是專門設計的，介於仿宋與黑體之間，這種字體既莊重又易讀，尺寸比二號標題字還大（行內稱「36磅字」），單字高1.5厘米。雖是線裝書，內容卻是「批林批孔」這類在那個特定年代才有的內容，當然也有四書五經之類的篇章。

我對這種「大字本」曾有耳聞，是專為毛澤東定制的書。毛一生酷愛讀書，手不釋卷，晚年由於眼疾，視力日衰，一般的書已經無法閱讀，加上身體虛弱，他更喜歡像古人那樣穿着睡衣，不分晝夜，臥牀閱讀。讀不了書，可要了老人家的命。中央決定每隔一段時間由毛開一個書單，再由上海、北京為主的定點印刷廠，在保密之下，全天候運轉，在最短時間內把書單上的書，用大號鉛字重新排印、裝訂成大字本，再用機要通道專程運抵北京，由姚文元送到毛的手裏。質量絕佳、速度驚人，我相信這種印刷史上發生的奇迹，緣於至高無上的政治任務。

大字本多則印二十份，少則幾份，同時也送給毛本人指定的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員閱讀。我家不是中央幹部，我手裏卻有幾本這奇書。事情是這樣的：

1994年西班牙巴塞隆拿的聖蒙尼卡藝術中心(Centre d'Art Santa Mònica)展出我的《一個轉換案例的研究》，就是那個身上印了文字的豬在展廳交配的行為裝置。豬圈內需要三噸雜書，以書代土墊圈。通過母親聯繫，我來到北大圖書館，副館長張老師領我在大樓裏東拐西拐的，竟來到了圖書館的地下隧道，是當年的備戰防空洞。洞道寬約三米，深不見底，兩側堆滿了書，看起來像文革時期留下的。張老師劃了一段範圍說：「這一段書你都可以運走。」我問他這些書怎麼堆在這兒？他說：「都是些顧不上清理的廢書。」我問，是文革中抄來的嗎？他說：「怎麼來的都有。」

書被運到巴塞隆拿，在布展時我發現雜書中有幾本線裝書，太好了！我要的就是有各種書，應該把它們放在顯眼的地方。我過去拿起這幾本書，書名竟然是《簡明中國哲學史》和《孔丘教育思想批判》。這些內容怎麼在古書裏？難道這些就是傳說中的「大字本」？是！是！是！大字本！

這書拿在手裏好舒服，因為它極符合傳統製書原則。東方製書的目的源自弘揚佛法、普度眾生，元以後追求文人清雅品味。中國典籍浩瀚，即使是為御用特製，也要分類別冊，厚薄得宜，款式古雅，精緻端正，便於翻閱。

豎排、字大，便於臥榻的讀書人單手握書，讀幾行捲幾行，這種方便是橫版書所不可能達到的。大字本

用紙是產自福建西溝村的玉扣紙，此紙又稱「官邊」，是古代宮廷供紙，呈淡秋黃色，摸起來綿密如絲。這書不要說讀了，拿在手裏就舒服。據說毛讀的最後一本書，就是大字本《容齋隨筆》，在醫生搶救的情況下，他堅持讀了七分鐘，這是他去世的前一天。

東西方對書的理解不同，下面講一本西方書的故事。

二 一本《聖經》

西方製書工藝發展的動力也源於對宗教信仰的虔誠。古典製書要讓書籍顯得厚重、堅固、裝飾繁密，無處不顯示着永恆感。一部書，要傾注人類工藝與繪畫的全部技能；體現侍奉主的決心。一部經典被打磨得與凡世間其他事物都不同，似乎就是世界的全部。

到美國後，我對西方羊皮書產生興趣，冥冥中我意識到，這些書可以為我找到一條通道，進入西方文明內部的密室，幫我認識歐洲的核心品味，從而理解古典藝術到現當代藝術品味的來路。若我想在這裏開始我的事業，這是必須的功課。

我做過各種嘗試，其中有一件名為《後約全書》的創作。我把《聖經》新約全篇與一本當代通俗小說合成了一本書，方法是將兩本書中的詞交錯排在一起，從而每跳過一個字讀，就能讀出其中一本書的內容，而另一本書的文字卻以一種特別的方式對讀者起着作用。兩本書的兩類詞彙以不尋常的關係，出現了意想不到的超思維的敘述。